

崇祯大旱与北方地区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

○ 温震军, 赵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崇祯年间, 北方地区出现了以连年大旱为主的气候灾害, 导致大部分区域粮食歉收或者绝收, 野外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少, 人们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不断出现。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的减少是争夺出现的客观因素。据争夺人群规模划分为个体以及小群体之间的争夺和跨省区的大规模的争夺, 据争夺人群个体组成状况划分为部落之间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争夺。争夺引发的武装冲突使自然生境受到破坏, 也使生境中的人(消费者的主体)大量死亡, 缓减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但争夺带来的环境破坏是主要的环境效应。争夺使众多饥民的生存希望建立、生存需求得到满足, 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争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并使社会逐渐有序化。

〔关键词〕崇祯大旱; 北方地区;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 社会环境效应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8.020

关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社会变迁, 虽然已有众多学者在多个层面对此作过研究,^{〔1〕}但关于这一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研究, 学界尚处空白。笔者视崇祯年间的整个北方生态系统为一体, 把人既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又作为社会系统的主体, 追溯这一期间特大旱灾导致的人们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 并研究其生态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本文以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为主线, 探讨争夺的原因、动力和争夺的表现形式以及造成的社会、环境效应。对于同时存在的政权争夺等将在另文研究。

作者简介: 温震军, 历史学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讲师; 赵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 史念海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博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11&·ZD097)、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二千年来陕西地区季风活动与气象灾害研究”(S2011YB01)的阶段性成果。

一、崇祯年间的大旱对食物等资源的影响

(一) 北方地区的旱情

崇祯年间(公元1628至1644年),王土北方地区出现了以连年大旱为主的气候灾害。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多个年份旱灾严重,东北地区多种气候灾害连年发生,^[2]整个北方地区的食物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连续干旱较长的时段主要包括两个阶段:天启七年至崇祯三年(1627—1630)陕西地区连年干旱,崇祯十年至十四年(1637—1641)北方大部分地区连年干旱。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3]陕西地区天启七年(1627)3县有旱灾的记录,崇祯元年(1628)有16县,崇祯二年12县,崇祯三年23县。陕西大部分地区处于森林和西北草原的交界地带,生态环境脆弱,^[4]连年大旱使这里的生态环境首先遭到破坏。据文献记载,“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5]由“赤地千里”可以说明崇祯初年的陕西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年(1637),“夏,两畿,山西大旱。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6]“十一年,两畿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十四年,两畿、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7]

表1 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五省旱灾县域数量统计表

	陕西	山西	北直隶	山东	河南	总计
崇祯十年		9	15			24
崇祯十一年	25	21	16	20	13	95
崇祯十二年	7	8	29	24	26	94
崇祯十三年	47	47	71	64	82	311
崇祯十四年	5	15	41	23	18	102

资料来源: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63—1623页。

由以上文献及统计数据可知,从崇祯十年到十四年,黄河流域、海河流域的多个区域连年大旱,其灾情逐年累积。崇祯十四年,北方部分地区的降水增加。崇祯十五年,北方地区气候恢复正常。

(二) 干旱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连年干旱对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大部分地区粮食歉收或者绝收。河南郑县,“崇祯八年至十三年,每至夏,亢旱,飞蝗蔽日,禾枯粮绝。”^[8]兰考县,“十一年秋七月至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方雨,麦尽干枯。”^[9]汲县,十一年“秋不雨,麦未播种。”^[10]北直隶永清县,十一年“七月,蝗飞蔽天,食禾殆尽,饥民皆捕食之。”^[11]崇祯十二年,山西灵石县,“十一年旱,十二年旱,田园尽赤,民食树草,榆种断绝,斗米七钱,饿死载道者不可数计,人亦相食。”^[12]从以上文献得知,由于

干旱严重,有的地域未能播种,有的地域禾苗枯死或者被蝗虫食尽,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三)干旱对野生食物资源的影响

干旱使多个地域的野生植物大量死亡。崇祯十二年,山东泗水县,“十二、十三年,蝗害稼,野无遗草。”^[13] 阳谷县,“早,蝗食禾草树叶一空。”^[14] 河南济源县,“九月,草尽树赤。”^[15] 鄆陵县,“岁大旱,草木为焦,百谷无所入。”^[16] 崇祯十三年,山东临沂县,“蝗遍野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17] 河南襄城县,“大旱,蝗,秋禾伤,野菜青草尽皆枯。”^[18] 许昌县,“大旱,秋禾尽伤,青草皆枯。”^[19] 从以上文献可知,干旱使植被枯萎,与此同时,与旱灾伴随的蝗灾使草和树叶大量被食,于是野外的植物食物越来越少。

干旱使河流、湖泊干涸。十一年河南嵩县,“大旱,川竭井涸。”^[20] 崇祯十二年,河南沁阳县,“早,沁水竭。”^[21] 崇祯十三年,河南安阳县,“岁终无雨雪,井皆涸,长河有断流者。”^[22] 偃师县,“洛水深不盈尺。”^[23] 直隶安新县,“早,白洋淀竭。”^[24] “早,九河俱干。”^[25] 山西临晋县,“至六月不雨,赤地如焚,五姓湖水尽涸。”^[26] 山东鱼台县,“大旱,湖尽涸。”^[27] 崇祯十四年,河南郟县,“县西北,水泉皆竭。”^[28] 由以上记载可知,严重干旱导致多个地方的井泉枯竭,河流断流,湖泊变干。河湖干涸使鱼虾等水生动物死亡,野外草木枯萎迫使大量食草动物迁徙或者饿死,这样导致野外缺少动物食物。

二、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原因及表现

崇祯年间,北方地区的多个地域连年灾荒。崇祯元年、二年、三年,陕西地区连年干旱,^[29] 灾荒严重的陕西一带小规模起义军四起,^[30] 于是群体之间食物等资源争夺不断。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和十四年的连年严重干旱,^[31] 导致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多个地域粮食歉收或绝收导致严重的饥荒,^[32] 于是规模较大的争夺现象不断出现。东北地区在崇祯年间已被建真女真族统一,但在饥荒的年份,他们多次组织强大的武装力量越过山海关掠夺粮食和牲畜,下文中的史实能够证实。崇祯年间王土多个地域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较为普遍,北方地区尤为严重。当时的争夺现象遍及范围广、形式多样,显示了人们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

(一)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的减少是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客观因素

崇祯十年(1637)至十四年,北方多个地域粮食严重歉收和绝收,大旱使野生食物资源大幅度地减少,导致人们的食物严重短缺。陕西、山西、北直隶、山东和河南的多个地域有食物严重短缺的相关记载。

崇祯十年,陕西西乡县,“大饥,谨者相望,居民采草根食之至尽。”^[33] 崇祯十一年,山西稷山县,“十一年至十三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千文,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34] 陕西高陵县,“人以芥杆、榆皮为食。”^[35] 崇祯十三年,北直隶衡水县,“大旱,人食梨核、枣核、树皮、草籽,四境多殍。”^[36] 山东安丘县,“大

饥，斗粟至千余钱，人刮木皮，挑草根而食，间亦有饿死者。”^[37]崇祯十四年，北直隶新河县，“岁饥人病，民穷财尽，初杂糠秕，继食草籽、剥树皮。”^[38]山东峄县，“蓬蒿遍四野，民间鸡豚之类亦荡然无存，实数百年未有之奇变也。”^[39]由以上文献得知，崇祯末年北方地区人们食物短缺很严重。

表 2 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五省直接记载“食物严重短缺”的县域数量统计表

	陕西	山西	北直隶	山东	河南	总计
崇祯十年	6	4	6	6	4	26
崇祯十一年	10	11	6	4	11	42
崇祯十二年	9	5	16	17	18	65
崇祯十三年	45	42	74	63	79	303
崇祯十四年	23	29	48	38	32	170

资料来源：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63—1623页。

由文献描述及数据统计可知，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方大部分地域的人们出现食物严重短缺现象，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寻找多种类型的粮食替代品。农作物、树、草等多种植物体的残留有机体是人们采集的目标，家畜等家养动物被食尽，人相食是多个地方可以见到的现象，石粉是一些区域人们采集的目标，等等，当时的人们在环境中竭力寻找可食的东西。当环境中粮食替代品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是谋求新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的必然选择。比如，众多的人聚集和迁移并向城镇的富户、官府以及王府抢夺食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谋求生存的一种办法。

人们在争夺食物的同时也争夺其它物资。由于大范围干旱的持续，棉花种植受到严重影响。棉花产量的不足，导致织布的原料短缺，与此相随的是衣物短缺。当天气变冷的时候，衣物短缺能够导致人们生活的恐慌，因此，衣物也是人们争夺的主要物资。饥饿的人们，最急需的是食物，保暖御寒的衣服也是急需的，其它物资以及金银财宝也是他们抢夺的对象。比如李自成义军在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攻下洛阳以后，“没收了福王府中的大批粮食、金银财货和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40]于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41]当时正好是严冬，人们不仅需要食物，而且还需要过冬的衣物，还需要其它生活物资。以上事实说明，处在生存危机中的人们既争夺食物，又争夺其它生活物资。

（二）依据争夺人群规模划分的食物等资源争夺

个体以及小群体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崇祯初年，北方地区人口众多，^[42]由于食物严重短缺使民间出现了抢夺食物的现象，起初多表现为个体之间以及小群体之间的食物争夺。个体之间抢夺食物往往出现在偏僻的区域，小群体之间抢夺食物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组成集体能够发挥群体的优势。于

是,在旱灾盛行和旱灾刚刚过后,一些饥民群体出现在食物短缺的生态环境中寻找可食的东西。入室抢劫和拦路抢劫现象屡见不鲜,如果打进豪宅、官宅,一般情况下能够抢到更多的粮食。如崇祯十二年,河南安阳县有“遍地盗起,号曰‘打粮’,肆其抢掠,讫无官法矣”^[43]的记载。猎杀过路人,喝血、吃肉也能解决食物问题。如崇祯十三年,山西潞城县有“岁大饥,人相食,偏僻荒郊无人敢独行”^[44]的记载。无论个体还是小的群体,他们在一些地域有一些临时据点,但没有能力占地盘,寻找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小规模的食物争夺现象,食物与资源争夺是当事人的目的,不伴随政权的争夺。

跨省区的大规模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崇祯末年,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特大干旱,而南方多个地域维持了正常的生态环境。特大干旱对一些地域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果另外一些地域受灾少,生态环境依然保持正常,可以成为大灾后的缓冲地区,这也成为规模较大的跨省区食物争夺的基础条件。

李自成义军南下湖广是一次跨省区规模特大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45]崇祯十年至十四年的连年大旱灾使河南等地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十三年秋天,李自成义军的到来,使官府、衙门的余粮被迫拿出,解救了众多的饥民。十五年河南一带降水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46],但由于兵荒马乱,很多土地未被利用。到十五年冬,河南富人以及官府的余粮基本都分发了,而十五年生产的粮食非常有限,在这个时候,整个河南等北方的其它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因此,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统帅四十多万大军南下湖广。^[47]他们在粮食等物资供应不足时走出了河南,到达了粮食、物资充足的湖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次跨省区的大进军,是义军生存的需求,是整个队伍供给所需的被迫选择,是义军再发展的一种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几十万人马南下湖广,是拯救众多饥民的又一次大行动,是走出生态恶化区,寻找衣食资源的远距离的大迁移。如果义军当时向北进发,北方严重崩溃的生态环境会使几十万大军溃散。因为当时北方的乡下是青黄不接,而多个官府、重镇早已被义军拿下,已经没有存粮较多的地方了,因此,义军大规模南下是正确道路的选择。

崇祯年间,满族军队曾几次大规模进入关内,直接到达京辅地区,这也属于跨区域规模较大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出师复掠内地,兵锋南达济南府,克70余城,掠人口462303,其它财富珠宝尚不焉。”^[48]“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命将出师,入掠明朝内地,此次计掠人口369000,牲畜321000”。^[49]从文献得知,这几次进犯,其主要目的是抢夺食物和其它财产。在当时,他们的整体实力较小,明王朝的实力很强大,他们也认为消灭明王朝是不可能的,但为了度过荒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完全可以依靠武力取得争夺战的胜利,削弱明王朝的势力。

规模较大的跨省区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需要强大的集体武装力量作为前提条件。满族军队进入关内,靠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李自成义军南下湖广,也是依靠集体力量的强大优势。如果单靠个人或者少数人组成的队伍,无论跨越山

海关或者南下湖广,都会遇到自然、人为的种种障碍,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此类争夺的目的是得到粮食、得到其它军需补给、壮大队伍、占领更多的地盘以扩充势力范围,为建立政权奠定基础。

(三)依据争夺人群个体组成状况划分的食物等资源争夺

部落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在牧区或者林区,当食物等资源短缺时,多表现为部落群体之间的争夺。东北女真族世代居住的地方——松花江流域,是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地方。在明末,他们的卓越首领努尔哈赤,带领众多狩猎的民众,同连年的雪灾、冻灾、旱灾抗争,向周围的部落抢夺食物等资源。在抗争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他为众多追随者解决了衣食来源,创造了生存的条件。追随者的胜利信心在不断地增强,他顺应民心,统一了周围多个部落。据王景泽研究,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在抗击灾害中建国,在抗击灾害中发动对外战争。^[50]他们依靠强大的武力打败了其它部落,维持了本民族的生存,扩大了势力。天启七年,皇太极继位,在崇祯年间,他们威胁并求助于朝鲜,远征蒙古和明王朝,继续以征战的方式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饥荒,国力继续扩大。^[51]女真族的首领能够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在他的周围有很多为饥饿所迫的狩猎人,这些人响应号召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想生存下来。因为只有追随队伍,在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中才有优势,才能找到可食的东西。在生存道路上女真族势力不断壮大,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种部落之间的争夺,包括了食物之外的土地资源及其它财物的争夺,也包括了政权的争夺。

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劫取富豪和官府的食物等资源是灾年饥民得到食物等物资的主要途径,争夺往往在穷人和富人两个阶层之间进行。崇祯年间义军四起,他们在多个地域劫富济贫。义军攻下官府、衙门,其储存的粮食等物资被迫拿出,拯救饥民。义军得到了军需补给,也解决了众多饥民的吃饭问题。饥民响应和加入义军,在当时的生态条件和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灾民自救方式。只有他们集体行动,才有能力拿到富人和官府的余粮和其它生活物资。

从崇祯十一年(1638)至十四年,河南连续四年旱灾,十三年旱灾最重。^[52]李自成义军于十三年秋天进入河南。当时特大干旱造成的灾情还在延续,在河南大地上流窜着大大小小的饥饿的人群,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进入官府、衙门,还是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义军到来,使他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加入义军使他们心里有了归宿,食物等生活物资有了来源。李自成义军一呼百应,首先以豫西地区为落脚点,攻克了多个县城,夺取了洛阳重镇。到十五年冬天,河南大部分区域已在义军的控制之下。^[53]李自成义军在特大干旱的后期进入河南,向官府、王爷夺取了众多余粮和其它生活物资,拯救了数十万灾民,这已成为历史事实。从这一事实得到的启示是,在食物严重短缺的期间,只有组织纪律性较强的、有实力的群体才有能力从对立的阶层中夺取食物和其它资源,以维持本群体成员的生存。此类型的争夺,既包括食物等生活物资的争夺,也包括其它财物、地盘和政

权的争夺。

三、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环境和社会效应

(一)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环境效应

崇祯年间发生了形式和规模不等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导致了多个地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环境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争夺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使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另一方面,通过争夺,使生境中的消费者(人)大量死亡,缓减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争夺导致的武装冲突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在整个崇祯年间,义军接连不断地在各地兴起和流动,义军和官军之间大大小小的流血冲突不断。清军多次入侵关内和最后大规模的入关,导致了多次战役的发生。在当时和后世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明末的战争破坏自然生境的相关内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战争的地域和规模推知战争对自然生境的大破坏。

从天启七年(1627)到崇祯十七年,义军有整整十八年的发展历史。在发展的中后期,他们的作战经验不断成熟,进退有方,进则攻打官府、衙门,退则进入山中。如果从时间上来说,义军在山区停留时间较长,这样利于隐蔽。而众多人马在山区需要取暖和煮食,一定消耗大量的草木。大规模的人群进入森林,大量动物被人捕获,因为野生动物是战争中人们的一种食物来源,一些动物被人们惊吓被迫迁移。人们之间的厮杀、人马的践踏等等对生态都具有大的破坏。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制造兵器需要很多木料,修造船只与修筑桥梁需要木料,建造攻城的架梯需要木料等等。

在义军发展的中后期,规模很大。如李自成第一次攻打开封,“带精兵三千,步卒三万”。^[54]他率部南下湖广时,“率主力四十万人”。^[55]而张献忠等其他义军也有较大的规模,明官兵的数量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很大,因此,崇祯年间的持续时间较长且规模较大的战争必然会破坏森林、草地,动物被捕杀或者被迫迁徙,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这种争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较快速的,是争夺造成的环境效应的主要方面。

争夺造成的人口死亡减缓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在明清小冰期的大气候背景下,明末气候变冷变干趋势更加明显。^[56]当时的北方地区以农耕和畜牧为主要行业,其经济类型较为单一。当气候变冷变干时,特别是当特大气候灾害发生时,绿色植物创造的有机质迅速减少,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单位土地上的人口承载力大幅度降低。而明代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明末人口数量众多。^[57]当特大干旱发生时,人口众多的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

由于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出现了自然和社会两种人口淘汰的方式,而两种方式往往结合在一起。饥荒年间人口优存劣汰的过程是一种人口自然淘汰的方式。当一群群饥民奔波于找食的途中,一些老弱病残等弱点较多的人由于得不到食物而死亡,而生存下来的人有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存劣汰的规律体现很明

显。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和战争是一种人口社会淘汰方式。当武力冲突和战争出现的时候,常常都要死伤很多人,而参战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众多人死于瘟疫是人口的自然和社会两种淘汰方式相结合的表现。单考虑瘟疫使人口死亡这一事实,应该属于人口的自然淘汰方式。但导致瘟疫大规模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大规模地流动。从崇祯十三年到十六年,由于社会动荡,人口流动规模大,使瘟疫迅速在北方地区蔓延扩张,很多人因此而死亡。因此,众多人死于瘟疫是人口的自然淘汰和人口的社会淘汰两种方式的结合。

葛剑雄先生研究认为,明清之际,全国人口下降幅度达百分之四十,华北地区人口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少达到百分之五十。崇祯年间,仅直隶、山西、河南三省死亡的人数达到 780 万左右。^[58]大量人口死亡,这是人们主观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上缓减了食物等物资短缺的压力,使争夺现象逐渐减少,同时缓减了众多人口对当时生态环境的压力,加快了生态恢复的速度。总的来讲,人口死亡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这是对生态环境有利的一面,但这种环境效应是次要的,要小于争夺对环境的破坏作用。

(二)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社会效应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社会环境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因此,社会环境必然发生大的变化。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众多饥民的生存希望建立、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人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当特大干旱导致原有的社会秩序紊乱时,当饥饿危及生命的时候,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了大的变化,生物属性更趋明显。求生、求存是当时人们的第一选择,此时人们对社会的诸多方面关注较少,食物在哪里?生活物资在哪里?这是最为关注的。在生存需求的驱动下,人们便进行食物以及其它物资的争夺,于是多个地域的流浪的饥民进行小规模争夺行动。当义军到来,很多流浪的饥民加入了队伍,参与了更大规模的食物等资源争夺的行动。同时这些饥民得到了维持生存的食物,他们有了归宿感,生存希望与信念开始建立。

一些精英人物的出现,为何有一呼百应、百川归海的纳众效果,因为他们了解民意,顺应了民意。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出身社会下层,他了解民众,深知民众的疾苦。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顺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李自成义军凝聚人心的很响亮的口号是:“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59]这样的口号,被饥渴困扰的民众听了,他们不仅生存的信念增强,而且对以牛羊、酒浆为食的美好生活产生了憧憬。为了心中的信念,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由以上事实可知,渴望生存是饥饿民众当时的主要意识,先想办法活下来是当时的生态、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第一选择,其具体行为表现为食物等资源的争夺,这些行为使众多饥民建立了生存希望,同时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

食物等资源争夺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崇祯年间的特大干旱导致北方

多个地域出现食物严重短缺现象,而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存粮集中在富人、官员等少数人的手中。以义军暴动为主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富人、各级官府多余的粮食被迫快速地拿出,拯救了众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饥民。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在地主、官僚、王室的眼中,义军是流寇。因为义军的行动危及了他们的生命,损坏了他们的多种利益。客观地来讲,义军的争夺食物等物资的行动,损坏了少数人的利益,甚至把这些人置于死地。但这样的行动使更多的在生死线上徘徊的饥饿的人得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把这些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而这些人群恰恰是当时农耕社会的劳动力的主体。因此,在当时的生态和社会背景下,食物等资源的争夺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利于灾后农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发展。

食物等资源争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使社会逐渐有序化。食物等资源争夺现象本身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天启七年,陕西的旱灾使众多百姓民不聊生,为了生存,义军首先在陕西地区兴起。^[60]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御史李应期上奏皇上请求救灾,当时的朝廷没有回应,更没有实施救灾措施。^[61]随着旱灾的延续,饥寒交迫的民众只能自寻出路,越来越多地涌入起义的行列。他们劫富济贫,抢夺粮食等生活物资。崇祯三年,部分义军进入山西^[62]。崇祯四年至九年,全国连年旱灾的区域较少,^[63]这一期间,义军同官军交锋不断,北方大部分地区社会动荡不安。崇祯十年至十四年,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连年持续干旱,^[64]于是遍地的饥民为了争夺食物和其它生活物资而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冲突现象,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达到高潮。伴随着各地义军再次蜂拥而起,地方豪强各居一方,收罗人马,保护地盘和扩充实力。一些强大的官军势力尽可能保存实力,并不断壮大自己,等待进攻的时机。李自成义军在中原一跃发展成为最强大的义军,张献忠义军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地域占据一方。总的来说,崇祯年间大小规模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不断出现,北方地区的多个地域社会一直动荡不安。

随着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条件发生大的变化,人们之间争夺食物等资源的行动逐渐被争夺地盘和争夺政权的行动所代替。从崇祯十五年(1642)开始,北方地区气候条件恢复,^[65]十六年、十七年,大部分地域农业自然条件愈趋正常。^[66]这一时期,几大军事集团之间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不断。十六年春,李自成义军在湖北建立襄阳政权,随后北上。^[67]十七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68]十六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69]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义军进入京师推翻了明王朝。^[70]四十多天后,清军入关,随后清军同几支义军的余部和南明势力继续战争。^[71]由以上史实可知,经过一段时期的食物等资源争夺战以后,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这个时候,争夺地盘和政权成为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后续行动。这些后续行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建立,社会趋于有序化。

四、结 语

崇祯年间,王土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以连年大旱为主的气候灾害,黄河流

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多个年份旱灾严重,东北地区多种气候灾害连年发生,整个北方地区的食物等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连年干旱对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大部分地区粮食歉收或者绝收。干旱使植被枯萎,与此同时,与旱灾伴随的蝗灾使草和树叶大量被食,于是野外的植物食物越来越少。河湖干涸使鱼虾等水生动物死亡,野外草木枯萎迫使大量食草动物迁徙或者饿死,这样导致野外缺少动物食物。从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方大部分地域的人们出现食物严重短缺现象,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寻找各种植物的残留有机体等多种类型的粮食替代品。

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的减少是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客观因素。当环境中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是谋求新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众多的人聚集和迁移并向城镇的富户、官府以及王府抢夺食物等资源是谋求生存的一种办法。处在生存危机中的人们既争夺食物,又争夺其它生活物资。

依据争夺人群规模划分为个体以及小群体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和跨省区的大规模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两种形式。依据争夺人群个体组成状况划分为部落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两种形式。较小规模的争夺主要是食物等生活物资以及其它财物的争夺,规模较大的争夺还伴随有地盘、政权等的争夺。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导致了明显的环境效应,它引发的武装冲突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是带来的主要环境效应。争夺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是带来的次要环境效应。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众多饥民的生存希望建立、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争夺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利于灾后农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发展。争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使社会逐渐有序化。

注释:

[1]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2页;王兴亚:《崇祯的用人 与明王朝的覆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第26—30页;董郁奎:《试论崇祯皇帝的历史地位》,《浙江月刊》1995年第3期,第108—114页;路建新:《明末官场腐败琐谈》,《文史天地》2002年第6期,第23—26页。

[2][51]王景泽:《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第48—53、48—53页。

[3][32][46][65][66]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01—1522、1563—1623、1629—1630、1623—1631、1631—1651页。

[4]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4年。

[5]《鹿樵纪闻》卷下,引自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第29页。

[6]张廷玉等:《明史·庄列帝纪》,《本纪》第23,上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页。

[7]张廷玉等:《明史·五行志》卷30《五行三》,第486页。

[8]刘瑞璜等:民国《郑县志》卷1《灾祥》,第91页。

[9]康熙《兰阳县志》卷10《灾祥》,引自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1575页。

- [10]程启朱等:《顺治《卫辉府志》卷19《灾祥》,顺治十六年刊本。
- [11]万一兼等:《康熙《永清县志》卷1《灾祥》,康熙十五年刻本。
- [12]侯荣圭等:《康熙《灵石县志》卷1《祥异》,康熙十一年刻本。
- [13]康熙《泗水县志》卷11《灾祥》,引自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1581页。
- [14]董政华等:《民国《阳谷县志》卷9《灾异》,第426页。
- [15]萧应慎等:《乾隆《济源县志》卷1《祥异》,第106页。
- [16]晋克昌等:《民国《鄱陵县志》卷29《祥异志》,第2047页。
- [17]王景佑等:《民国《临沂县志》卷1《通纪》,第63—64页。
- [18]汪运正等:《乾隆《襄城县志》卷9《祥异》,第576页。
- [19]张庭复等:《民国《许昌县志》卷19《祥异》,第1684页。
- [20]康基渊等:《乾隆《嵩县志》卷16《星野·祥异附》,第199页。
- [21]袁通等:《道光《河内县志》卷11《祥异志》,第411页。
- [22]汤传楷等:《康熙《彰德府志》卷17《灾祥》,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 [23]孙星衍等:《乾隆《偃师县志》卷29《祥异志》,第1636页。
- [24]王朝佐等:《康熙《安州志》卷8《祥异》,康熙十九年刻本。
- [25]乾隆《安新县志》卷4《襍祥》,引自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1588页。
- [26]赵意空等:《民国《临晋县志》卷14《旧闻记》,第594页。
- [27]冯振鸿等:《乾隆《鱼台县志》卷3《灾祥》,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 [28]姜麓等:《民国《邙县志》卷10《杂事志·灾异》,第611页。
- [29][31][52][63][64]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85—86、89—91、90—92、86—89、89—91页。
- [30][40][45][47][53][54][55][60][61][62][67][68][69][70][71]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32、134、164—167、164、128—156、136、164、28、32、50、173、209、187、244、277—320页。
- [33]薛祥绛等:《道光《西乡县志》卷22《祥异》,第100页。
- [34]沈凤翔等:《同治《稷山县志》卷7《祥异》,第841页。
- [35]白遇道等:《光绪《高陵县续志》卷8《续录》,第370页。
- [36]萧鸣凤等:《康熙《衡水县志》卷6《事记》,康熙十九年刻本。
- [37]康熙《续安邱县志》卷1《总纪》,康熙二年刻本。
- [38]傅振伦等:《民国《新河县志》《舆地考·灾异》,第100页。
- [39]李克敬等:《康熙《峰县志》卷2《灾祥》,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 [41]郑廉:《豫变纪略》卷3,崇祯十三年。
- [42][57]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 [43]马国桢等:《康熙《安阳县志》卷10《灾祥》,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 [44]张士浩等:《康熙《潞城县志》卷8《灾祥》,康熙四年刻本。
- [48][49]《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联出版社,1964年,第601—602、889页。
- [50]傅郎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 [56]张德二:《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历史旱灾——1784—1787年典型灾例》,《地理学报》第55卷增刊,2000年,第106—111页。
- [58]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 [59]《石匱书后集》卷63,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56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